

赋予叙事作品宽袤的自由度

——组诗《我凝视过的那些背影》的“现代性”路向

□ 蒋楠

黎阳组诗《我凝视过的那些背影》中的“背影”，揽括了傅天琳、牛汉、阿红、沙驼、白航、流沙河、李慧七位当代汉诗的代表性诗人，是读者了解他们个性特征的一扇诗性之窗。在他笔下，这些“背影”厚重、深沉，散发着强烈的人文气息，是理性与感性、肉体与灵魂、社会性和个体性等的多元聚合体。

这组作品被置于“未来发展”的语境之下，当诗人凝视那些背影时，新诗史正处于热烈的生成和变化、朝着未来的多维性敞开。诗人以守本创新的当代汉诗写作姿态，创作了一组现代诗人“群像”，并从这些具有膜拜价值的影像出发，走向造化于笔端，展现一系列关于诗人的个性及其语言、风格、影响力等透视线的“思忆式创作”。在影像与诗歌交汇的新维度里，反思现代汉诗那些既定的惯性模式，乘坐母语的“现代号”列车，在时代语境与美学追求共同架设之方法、结构、技术与作品系统性等站点循环穿梭。“在一场大雪落下之前/梭磨河走向我，她背着远山。”开篇《傅天琳，跟着水走的人》，作品凝练、充满清晰而规律性的印迹和象征性符号，呈现出一种山江情怀和孤傲气质。“跟着水走的人”，始终徜徉在现实之外、理想之上。洗净尘滓，令烟鬓翠黛处处皆成惬意诗篇。

作品《我凝视过的那些背影》有别于传统叙事诗，黎阳采撷“描写对象”——七位诗人生活中的某种动作、样态或事件，来置换叙事诗的顺时性、直线性叙述，探求当代汉诗在叙事方式上的凝缩化，探究当代汉诗所具有的现代性。

要想真正体悟黎阳这组作品的奇奥之处，而不单单知晓这组作品的叙事架构，还得了解这七位诗人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乃至他为创作这组作品所作的筹备“工作”。展读组诗，笔尖紧紧追随着诗人们的踪影，透露出一种果敢的辨认。在他的诗行中，这些诗人是一个个活生、风趣、可敬、复杂而又坚定的人物，而黎阳对七位诗人“群体造像”原创性的纾解，敏锐而真挚。

具体在“群像”的规模感，描述时的从容度、最细微的信息量、在场感等元素，让人感觉是出自带有体温甚至思想的有机构造。更重要的是在“背影”的多重叠加之下，整组作品依然能够真实清晰、从容自然地透过肌理，凝视骨骼。

鲜明的时代烙印 多元的众生世相

——读长篇小说《牛堰河畔》

□ 贾登荣

由苏立、秋天创作的长篇小说《牛堰河畔》，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成都农村为背景，用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语言，讲述了发生在曾桥大队（曾家湾）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再现了特殊岁月的风云世相，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是一部有厚度、有深度、有温度的乡土文学作品。

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客观高度的观照。大集体生产时期，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农民的手脚被牢牢地捆绑，缺乏生产生活的自主权。于是，一件件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诞的故事就陆续上演了：那天，曾桥大队的曾家富在太平镇东场口摆起修补摊子。刚准备给一个大娘补锅，几个臂戴执勤的大汉就站在他面前，在催促他收起摊子的同时，还面对赶场的众人大声宣布说，个人出来补锅，是单干打野，要坚决刹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歪风！然后，便将曾家富揪回生产队，加以批判。当时，不但不允许农民外出外出搞务工、做生意增加收入，也就是所谓的“打野”，而且在具体种田的方式方法上，也有许多啼笑皆非的安排。栽“竿竿秧”就是其中之一。所谓栽“竿竿秧”，就是用绳子把水田划成一厢厢的格子，插秧的在格子里排着整齐的窝距。其实，这样的方法，不但增加劳动成本，而且根本无法保证栽插进度，有可能贻误农时，因而受到农民的抵触。此外，作者还描写了政治夜校、理论学习、文艺宣传队、民兵夜间巡逻、推广

描述《沙驼，你是一个倔强的老头》时，诗人将“造像艺术”与“写实句法”揉搓起来，以言造象，以象寓意，创作出深具个人风格的诗歌作品。阅读这样句子，能感受到其中的静穆、庄重、慈悲与仁爱。

成熟的诗人都有独属自己的表达方式。最重要的并非依靠固化的形式与语词，而是要“重装”它，赋予时代感衍生的精神气质。《白航，星光里的隐喻》回应了后消费主义潜藏于世人内心的某种精神诉求，在抒写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心理上，恰恰越过了社会表象的描绘：“从高原中走过的人/在寂静的夜空，点燃了三颗星星。”诗歌以象征与隐喻，融合更丰溢、更深阔的社会意涵，这才是汉诗更深层的一种现代性精神凸现。

诗人以现代性叙事方式，向“那些背影”致敬的同时，反思传统叙事诗的局限，倡导更为有机和整体的汉诗现代性路向。沿着现代汉诗的发展路径，诗人去触摸前辈诗人的脉搏，有故事，有温度，更有态度。组诗成为了一种碎片化的观察、叙事旁白，也赋予叙事作品更为宽袤的自由度。

“站在草木中间，就成了一群/树木的天花板。”《流沙河，那只蟋蟀》，文本从外部世界逐渐转移至内心，坦率而充满力量和情感。黎阳在向前辈诗人表达敬意的同时，施显自己的情怀。生活的洪流，只在语言的反思中才能显示出其节奏、旋律和意义。“流沙河”流淌着，其内在自我节奏要比其他的灵魂润泽许多。

诗人将文本纳入到现代性所预设的叙述中来，似乎产生一种超时空诗意平行，这正是“那些背影”能穿越历史、跨越地理，为人们所认识和接纳的缘由。现代性还是一种话语建构，至少是带有一定理想色彩和时间维度的诗学建构。黎阳与笔下诗人面对的“现代性”语境与涵义亦不尽相同。现代诗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只是人类进入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之后，时代变化的节奏加速，人的异化进程也随之变快，诗歌语境发生激烈的变革理所当然。

“我想用汉字，替代血汗的汗/用假假字替换/落成此生木本革命的坐标。”《牛汉，汗血马》铺展出愈发连绵与稳健的一种秩序感和理想主义情结——当繁体的“汉”字，演变为一种象征符号并建立归属感，承袭“华语诗人”中思想者的内在感召力，有呼喊，也有律度。甚至就是在这个不断更迭的律度上，诗人正在操纵着词义의

双季稻、农田基本建设、清理林园等林林总总的事件。通过这一桩桩并不惊心动魄，也无暴风骤雨的事件，从容不迫地展现出特殊岁月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以阶级斗争为纲”，高度的计划经济，让地处天府之国腹心、成都平原上的曾家湾，居然闹起了春荒，不少人家出现缺粮饿肚子。

小说展现出多元的众生世相。塑造人物，是小说最重要的课题。在这部30多万字的小说中，出现了上百个人物。有区委书记郭民生、公社书记何庆元、修缮队长姜青云、曾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钟建华、大队长严久思（严官）、大队会计曾兴礼（曾么爸）、渔场场长殷志远，下乡知青赵文军、付强、“理论专家”罗显华、右派女儿刘冬梅，地主后代曾家富，以及罗跃先、林德瑜等等。每一个人物，都有自身的特点与光芒，为构筑小说坚实厚重的“大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队党支部书记钟建华，是小说重点刻画的人物。这位在部队当过四年兵的青年党员，原本一心想跳出“农门”，到城里当工人，不想，公社偏偏让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尽管有些不情愿，但他满怀“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誓言，名无旁贷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对上级的指示，他不管是否符合农村实际，都一味绝对服从，从不打半点马虎。如为了制止群众外出“打野”，他亲自主持批斗会，斗争曾家富，以警告所有群众；尽管是农忙时节，他也要坚持办政治夜校，组织农民心理学，唱样板戏；他积极推行“竿竿秧”，

现代性。

从现代诗正式分娩那一刻起，“汉诗的现代性”都表达了革新的诉求和主张——它的五脏六腑都是新的，涵括新思想、新语式、新样貌。就汉诗的现代性而言，古典汉诗使人们体验出来的是“味觉”之美，而现代汉诗则直观、生动、形象地向受众提供生活符码，呈现给读者的是视觉效应。可以说，黎阳对汉诗语境的征引与再造，并不受现代汉诗演变时序、推进过程的束缚，而是后现代境域下的文化本原需求而发生的为“我”所择、为“我”所用的“镜像重生”，也构成了汉诗现代性的“视觉再造化”特征。

“我们眼望着诗歌的潮水/推动着一个又一个初识者/在浪花里成为浪花。”在《阿红，这微弱的光，烧亮了鸭绿江》里，“当代是个虚词”中的“虚词”，来自其满溢的毁灭与拒绝性——技术进步、实验、逆转……21世纪对古典、对浪漫的解构，早已被时代消融了。“诗歌才是动词”，已然积淀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本能。带着这样一个“视觉再造化”的新使命，创作既具有中国精神又有人生意义的诗歌文本，才更具现代性。

组诗是诗人心灵及其无限性空间上的映射——厚暖、沉稳、饱满带着宽松的特质。“那些背影”只是黎阳与“诗人们”之间的和谐托托与对话，包括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自然时间的对话。由“过去”和“现在”构成的语义轴，明显地将黎阳的社会理想、审美理想、价值中心寄放到了不曾远离的“背影”中。在当代语境中，将历史拉回现实，进而重新组织当下的认识系统，这需要书写者进行系统、方法和结构性的创制。

“从词语的呼麦声中/传出肺腑中的草原/我在你宽大的身影中/看到雪山、河流、花朵。”在《李慧，折翼的雄鹰》里，黎阳从诗人的背影上，看到的是“雄鹰”，既表现了一种凝重的生活诗意，也体现了黎阳富有个性的文本探索。“背影”的文化审美内涵也从人格象征转向自然与生命寓意的表达。

黎阳将笔下七位诗人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进行适宜排布，其间细腻的抵拒，时不时在自述的词境中展开，夹杂着“影像”中零碎、复杂而动态的信息。作品里的“背影”，像是一个个基本粒子，不断累积变化，变得更立体、更丰满。诗人本人的脉搏，也在词与词之间起伏，在当代性语感中热烈地灼烧。

读完《酒香戏外》（《小说月报》2023年第8期），总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部具有转型意义的短篇小说，是对赓续本土历史文脉、讲好酒城故事，一次探索性质的书写。

小说锁定上世纪20年代，撷取四川泸州最具人文特色的三大领域——酒文化、“泸州河”戏曲文化和载入党史的“泸州起义”。翻开小说，扑鼻而来的就是那股由岁月陈酿的老窖浓香，诱惑着我们一步步走进那位擅酿琼浆的大国工匠高明远，以及他那神秘的高家酒坊。

酒文化，无疑是酒城文化的龙头和主体。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江安食不足，江阳（泸州）酒有余”的繁荣局面。宋人唐庚，更有“百斤黄鲈脍玉，万户赤酒流霞”之绝唱。据《宋史·食货志》载：“太平兴国七年……泸自春至秋，酤成即霁，谓之小酒，自五钱至三十钱。腊酿蒸霁，候夏而出，谓之大酒。自八月至四十三钱有二三等。凡用秬粟黍麦等，及曲法曲式，皆从水土所宜”。再看小说主人公的酿造工艺和用料，亦如史料所云，就连酿酒用的水都是专用水：“高明远每天去营沟头的龙泉井取水，挑回六担……”然后才闭门酿酒。“整个上午，只有醉人的酒香，从门的缝隙飘荡出来。”

除了超人的酿造工艺和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之外，高家酒究竟高在哪里？小说用了三个细节：一是高明远每天只卖三十斤白酒；二是说高家酒比获了国际金奖的酒还好。“说前些年，温家酒坊，送到海外获金奖的又不是温家大曲，是温家人来高家买回，装在温家酒坛，送到海外参加评奖”；三是高家酒有自己的个性，不可替代：例如川戏名伶陈三卿，就能在众多好酒中品出高家酒的独特风味。她说，好比“同一出戏，张三唱，李四唱，你们听不出？酒，一个道理。”

小说还有一个细节：“桐油店张老板，替母亲办八十大寿，特请陈三卿前来府上唱堂会，并为老寿星献酒冲喜。陈三卿也直率，问张老板，我那几杯高家酒，应该准备好了吗？张老板直点头。其实，张老板

藏有心眼儿，他就不信你陈三卿，能把酒城这家那家的酒喝出来？于是张老板就用温家酒替代。温家酒的短篇小说，是对赓续本土历史文脉、讲好酒城故事，一次探索性质的酒待客，供你陈三卿献酒，有面子了。”哪晓得，在喜庆的鼓乐声中，“陈三卿端着酒献老寿星，那酒刚进嘴，即如彩虹般喷射而出。陈三卿笑盈盈的脸陡然间结满冰霜，冷冰冰地说，你坏了我的规矩。这不是高家酒！”如此描写，一石三鸟。首先是省了“说酒”的笔墨；继而顺手牵羊，把区域人文的另一板块——“泸州河”戏曲文化连带出来；同时，让人物关系相互纠葛，进而又衍生出酒城文化的另一大板块——泸州起义。陈三卿这个人物设置得很有意思，她是整个故事的纽带，在小说中起着“串戏”的作用。

“泸州河”是“戏码头”的口称。“泸州河”戏曲流派的形成，有着多种社会因素。早在1907年，泸州就有了民办的川剧艺术学校“自志科班”。当时誉满全川的川戏名旦谢海潮、花脸赵焕臣以及名优帅志华、邱志愚、黄志贤等就出在“泸州河”（见《川剧辞典》）。“泸州河”戏曲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不能忽略这座两江环抱，三省通衢，商贸云集的地理位置。

小说倾情塑造的女一号陈三卿，就是“泸州河”川剧艺术的杰出代表。陈三卿是个孤儿，自幼本朴勤劳，经老族长求情，“班主遂收容，每天让她踩跷挑水，胯下夹木棒走台步……”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终于修成正果。不过，旧社会的女演员地位低下，常被权贵人物叫去培酒。陈三卿也难免流俗，但她却是一身正气。当时就“有人说，她唱戏，是给那些开会的共产党人打幌子”。不久，“泸顺起义”爆发，得到证实：“1926年12月1日，驻扎在蓝田坝的袁品文旅长以邀请军政长官参加军训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为名，将驻防城区的李章浦旅长诱至蓝田坝逮捕。下午四时，袁品文旅长、陈兰亭旅长宣布起义。”

小说在尾声中还作了特别补充，说：“多年后，高明远早已离休，坐在轮椅上，酒城党史办的人找到他，送上一份资料，请高老帮忙把

盐场风云背后的生存之道

——读傅恒长篇小说《大盐商》

□ 高仁斌

因盐设市的自贡，被誉为“千年盐都”。盐业开采所带来的繁荣是这座城市历史的荣光，也是滋生文学作品的重要养分。傅恒先生的《大盐商》关注的正是这个主题。小说以自流井盐场的风云变幻为背景，围绕底层人物舒致怀的人生历程，讲述了一个普通盐工逆袭成为盐商后，所面临的困惑、纠结、无奈、绝望和果敢。

历史上的自贡，有过两次“川盐济楚”的辉煌，《大盐商》讲述的恰好是抗日战争时期，自贡盐场发生的历史事件。在舒致怀人成长这条主线下，小说共设置了《逆袭》《被逆袭》《纠缠》《反转与被反转》《如何翻篇》五个章节。作家把舒致怀这个人物形象定格于抗战前夕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舒致怀是盐场风云中的一个个案，也是自贡盐商的一个缩影。他有着单纯、励志、世故等多重性格：他是地位卑微的盐工后代，是靠着顽强精神支撑的底层人物，是获得过无数人帮助的逆袭者，是被世俗观念裹挟的后起盐商，是在一系列事件中迎面四面楚歌的可怜人，是最终为正义付出生命代价的盐场英雄……作家想给我们呈现的，是一段近乎真实的盐场故事，以及盐场中各色人等别无选择的生存之路。

酒香戏外·向世界发出泸州声音

——读曾瓶短篇新作《酒香戏外》

□ 王楚华

资料写道：“陈三卿女，四川泸县人。1906年生，192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泸县特支宣传委员、组织委员。1926年12月参加‘泸顺起义’，任泸县特支副书记、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副教导员。1927年4月22日，随起义军在与川黔联军激战中，牺牲于酒城龙透关。”高明远捧着那份只有三页纸的资料全身不住颤抖，过了很久，才说，我是由她引上革命道路的。她的川剧，唱得真是好！老人沙哑着苍老的嗓音，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眼泪，滴在资料上，像一朵朵清明时节的花。

这个结尾具有点睛之妙。至少在技巧上彰显出现实主义的叙事优越，不但增强了通篇的真实性，其“凤头猪肚豹尾”的框架结构也随之清晰。而且，这个“豹尾”结出了满满一腔正能量。作品亦由此深刻起来！

一步步地变成了事实。当然，按盐都既定的社会规则来看，舒致怀的这一行为已经变得不合常理，甚至不合规矩。所幸的是，清政府已经垮台了，他的这一行为不仅没有招来麻烦，还创造了开凿深海井的奇迹，也完成了他人生的逆袭。然而，当他真正步入盐商行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甚至陷入纠缠不清的泥潭，招来莫名的仇恨。当云雾逐渐散去的时候，舒致怀才终于明白，处处与自己为敌的人，不仅有盐场固有的强大实力家族巩德彬，以及活跃在盐场周边说来就来的棒老二，更有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感情纠葛的桂芳、叮叮和五妹子的影子。在盐工命案、老镇闹事、土匪抢盐、奸细作祟、谎报盐损失、商行火灾这一系列事件中，舒致怀被纠缠得身心疲惫，他每天都活在各种猜疑、指责、敌对的目光中。当舒致怀与隐藏在盐都的日本间谍崔老板在小山坡上同归于尽的时候，他的心愿终于实现了。而关于舒家秘籍，舒致怀早已做了安排：他想和二公子商量，适时的时候把秘籍捐出去。

以盐闻名的盐都，是一个独特的社会。以巩德彬为代表的盐商家族是盐场的代言人，在舒致怀凿井制盐的逆袭过程中，巩德彬一直处于对立面。巩家是世代盐商，在盐场有着充分的话语权，巩德彬的爷爷就曾在咸丰年间带头反对朝廷一再加税，闹出了轰动一时的捣毁支撑，是曾祖父留下的舒家秘籍。在年幼的舒致怀看来，守住这个秘密，就是活下去的理由，当然更是为了能被别人放在眼里。他破天荒地想到取荒塘里的水来熬盐，这件事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居然一

法就是自己的二公子舒廷钦早一些娶了巩家大小姐巩艳燕，这样似乎可以缓和一下舒家被人看不起的局面。然而二公子舒廷钦和大小姐巩艳燕却是一代自称“时代青年”的人，他们虽然都是盐商后代，但却有着不一样的新思想。他们憧憬的是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时代青年，如何集中精力干自己擅长并对社会有益的事。

盐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又纠葛得特紫的三家儿，除了舒家和巩家，还有姚家。巧合的是，在姚知县离任八十多年后的民国三十一年，他的后人姚徵远来到盐都当市长。姚徵远留学过三个国家，本来是留在国外研究化工，七七事变后，姚徵远决定回国效力，却意外被四川省府列为盐都市长候选人之一。海盐因战争停产，并盐便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物资，盐都为此升格为直辖市，两年多时间换了几任市长，一直没有合适人选。令姚徵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到盐都上任，就遇到了千年不曾发生的群体事件——盐工命案。由此开启了姚徵远在盐都艰难的从政之路。巩德彬家族的势力影响，舒家盐场的麻烦不断，盐场各种帮派的利益纷争，周边土匪的骚扰，日本飞机的不时轰炸等等，都在等着他出面调停安抚。妥协、斡旋、亲力亲为，或许是姚徵远无法回避的生存之道。小说在结尾写道：面向墓群，姚徵远深深鞠躬，从内心深处涌出谢意，是盐都的父老乡亲，让徵远实现了体面离开的愿望。

《大盐商》给我们呈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盐都史实，同时更是通过人物塑造的方式，给我们揭示了在时代洪流中，人们对命运的思考和选择。